



知先生者谓先生心忧 不知先生者谓先生何求

文 / 王春新 戴亦一 孙秋碧

今年是钱伯海先生诞辰 85 周年。我们相聚一起,追忆先生走过的人生旅程,感怀恩师的亲切教诲,感触良多,难于忘却。先生虽逝,却精神长存,他留给我们道德学问、学术思想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更激励我们将之发扬光大!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1951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统计系后分配到厦门大学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硕果累累、获奖无数、成就斐然、赢得很高的荣誉。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建树卓著、成就斐然

先生一生,勇于探索、勤于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先后出版了 30 余部专著或由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发表论文一百余篇,累计在 1200 万字以上。他的学术研究横跨统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学界泰斗。先生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建或主持创建了多门经济统计

新学科,对整个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两个层次的运动——国民经济运动和企业经济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二是对我国国民核算制度改革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长期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三是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他为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及经济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被誉为“钱氏定理”,适用于各种经济统计核算,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价值。难能可贵的是有些成果是在“左”风盛行的“文革”后期取得的。先生以革命者的道德勇气,顶住了一些责难和非议,艰难地摸索探求。例如在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的建立中,首先要在理论上确认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这在当时很容易陷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泥潭。在艰难的困顿岁月,先生怀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突破禁区,研究价值论等一系列理论核心问题,提出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创

造价值理论。尽管这些提法,当时未得到政治经济学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有人动辄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然而先生胸怀宽广,为追求真理毫不畏缩,继续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不断完善其劳动价值理论。今天看来,这些思想具有很强的预见性,都得到后来实践的证明。

由于先生一生勤奋工作,并做出重要贡献,因而获得了很多荣誉,论著中有三项获得国家级奖,十三项获部、省级奖;先后六次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模范及孺子牛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两次被评为国家部委系统优秀教师,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委的奖励和表彰;列入多种版本的世界名人录;1992 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评为“20 世纪有成就的世界名人”,被美国传记协会选定列入《世界 500 名有影响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名录。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攻坚克难、励志兴华

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

具备的种种可贵品质，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财富。先生以他那高尚的思想品格、民主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无数莘莘学子。先生在教育战线上驰骋了五十多个春秋，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历来为学生作签名的纪念册上，经常写上“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题词，勉励学生立志守恒，同时把远大理想与踏实工作相结合，努力造就有用之才。这些格言也是他自勉和身体力行的。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大，目睹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任人欺凌，多灾多难，认为必须清除腐败，打败侵略，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中国人落后，但中国人不能永远落后，这些从小就在他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给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为此，他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归宿，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勤务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添砖加瓦。

当然，中国古老的文化思想传统，人贵有志，穷不矢志，人穷志不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也对先生为人民教育事业竭尽全力注入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虽然他经常说“生平无大志”，表现谦虚和谨慎，但在内心深处却经常受到“志”的驱使和鼓舞，认为在树人的道路上，有志而无恒，志就会落空，有恒而无志，就会陷入低层次、甚至烦琐哲学之中。因此，他怀着人贵有志、学贵有恒的精神要求，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科学的道路上，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多种“壮志”和重要任务。

民主待人、奖掖后进，惜时如金、治学严谨

先生一生处事公正，廉洁奉公。他始终认为集合力大于个体力的总和。无论是担任院系行政领导，还是日常学术研究中，先生一贯秉持团结但不失原则的工作态度和严谨作风，努力发挥集体的协同力量，建立一支

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使厦大统计系的科研成果长年丰硕，人才辈出，领先业界，享誉同行。先生还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推荐同事和学生担任教材的主编、副主编，前后达一二十本之多。对于一些专业性评奖活动和项目申报，先生也总是谦让再三。他在学术上倡导民主之风，从来都不强加观点于人。先生这种“克己奉公、团结协作、民主治学、扶掖后进”的高风亮节，被人津津乐道，广为传诵。

先生一生惜时如金、治学严谨。他一生都在忙碌地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就连出差旅途上都在思考写作。他常常用其家乡的谚语“牛耕田会老，闲着也会老”教导我们，要我们安贫乐道，专心学问。先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他一生勤奋工作的真实写照。在治学上，他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提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能够出全集，即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得住自己的学术良心。正是因为坚持这些原则，先生才能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攻克一道道理论难关，攀跃一座座学术高峰，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积累性和继承性。记得有一次为了研究国民核算，他带学生到郊县做试点调查，一蹲就是三个月，而且没有回过家。在2001年，为撰写论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论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的根本关卡》，需要查找一个引证，他不厌其烦地一日数次往返校图书馆，直到查清出处为止。还记得2011年，先生出版自己的专集（《钱伯海文集》），上下五册、共计300多万字，他一丝不苟，认真反复地一遍又一遍校对修订。先生在他的文集中写道“感到太困，太疲累了”，太困是因为长期睡眠欠佳，疲累则源于战线过长，以致最终影响身体健康。但我们深深地明白疲累的背后，是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先生追求真理的执着。作为一个学术大家，先生原本可以不这样疲累，可以活得更加轻松潇洒，然而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我们依然记得先生多次对我们说过“看来这辈子是停不下来了，要研究的东西太多，时间远不够用，我也想缩短战线，结果缩而未短，还越拉越长……”。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在积极思考学术问题，想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写一本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专著，框架都打好了，但却没来得及写出来，实属其终身的一大遗憾。

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但他的生命活得充实、精彩。正如原国家统计局张塞局长在庆贺先生执教5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他用他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度过了而立之年，度过了不惑之年，度过了半百之年，也度过了古稀之年”。我们不禁慨叹人生哪有这么多年！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以这句话来形容先生的言传身教，无疑最为贴切。学高为师，德高为上，先生就像一面镜子，铭刻着过去，照耀着现在，更展示着未来，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向前。☐☐

作者单位：中银香港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州大学统计学系

